

世界文化論壇報

CULTURE COMMUNICATION

北美第一家華人文化報 在美華人的精神家園

2023年12月31日

第98期

國際標準期刊號 (ISSN):

1540-2339

主辦：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 (IPDC)

協辦：美國過程研究中心 (CPS)



趙光武先生與過程哲學

曲躍厚

轉眼間，北大趙光武教授離開我們已經一年多了。2022年11月10日，得知先生仙逝的噩耗後曾想去送上最後一程，無奈疫情防控未能如願，實乃一大遺憾。

我和趙光武教授相識于1984年。這年6月，我從《光明日報》上得知，為解決高校師資匱乏問題，教育部委托一些重點高校舉辦助教進修班，接受具有兩年以上教學經驗的高校教師入校學習。時間一年半左右，入學需經過考試，優秀生可申請碩士學位。當時，我從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後分配至上海第二軍醫大學工作後正好兩年，于是便報考了向往已久的北京大學哲學系，認識了包括光武先生以及黃楠森、朱德生、王太慶、湯一介等哲學名家。

光武先生時任哲學系副主任，為我們班講授唯物辯證法專題課。先生給我們的第一印象，用今天的流行語來說就是一個字：酷。這不僅是因為他的相貌、身材、衣着和穩重，更是因為他上課憑的就是一些卡片，滿腹經綸、娓娓道來，條分縷析、說理透徹，可謂眾生的偶像。我們這些來自全國高校的助教們從北大的恩師那裏學到了很多東西，一些人後來還成了北大、清華、浙大、

南開等高校的知名教授。

知識易學，學位難拿。畢竟，我們入學時沒有參加全國統考，教育部文件對申請碩士學位的規定也語焉不詳，全班不少同學到後期對此特別關注。好在一有尚方寶劍，上級文件是公開見報的；二有同學的不懈努力，多次到主管部門走訪；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有後來擔任北大研究生院副院長的光武先生的鼎力支持，做了大量深入細致的工作，上級終於同意我們班作為助教進修班學員申請碩士學位的試點班級。後來的三年時間內，全班47名同學中有18人經過嚴格的考試（包括外語考試）、嚴格的答辯（系裏為每位申請者配備了指導老師）獲得了哲學碩士學位，我也以《腦科學研究中的直覺問題》為題申請答辯并獲得了學位，這是我人生和

本期要目

- | | |
|--------------------------|----|
| ◆ 趙光武先生與過程哲學 | 01 |
| ◆ 理性的冷峻與關懷的溫度 | 03 |
| ◆ 生態文明 從心開始 | 05 |
| ◆ 教學理論研究領域的懷特海之光 | 07 |
| ◆ 建設性後現代主義與中國式現代化的生態文明建設 | 09 |
| ◆ 真實的謊言（二） | 10 |
| ◆ 身體是走向樹木的秘密通道 | 11 |
| ◆ 賈平凹小說的生態意識 | 13 |
| ◆ 說有機話，做生態人 | 15 |

求學路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如今，三十多年過去了。憶往昔，慨萬千。即使在今天，要辦成一件事是何等不易，更何況這在當時是一件嘗試性和開拓性的事。據我所知，全國高校助教進修班學員申請碩士學位并獲得成功者，祇此北大一家。北大之開風氣之先，光武先生之愛生如子，由此可見一斑。

離開北大後，我因夫妻分居兩地從上海調至天津，和光武先生斷了聯系。1997年，我去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外社會科學》雜誌社送稿件，結識了北大校友系友、時任《國外社會科學》常務副主編的王治河先生，研究方向轉向過程哲學，并在他的幫助下于2001年赴美國過程研究中心訪學。2002年夏，在北京師範大學舉行的國際過程哲學研討會上，我和光武先生有幸重逢。這時他已71歲且退休，但仍擔任北大現代科學與哲學研究中心主任。會上，先生和來自臺灣地區的程石泉（時年93歲）、來自美國的小約翰·柯布（時年79歲）和大衛·格里芬（時年65歲）等中外過程大咖都有交流。因為他對過程哲學和建設性後現代主義情有獨鐘，對懷特海在分析哲學占主導的西方仍堅持思辨形而上學、對柯布和格里芬在解構性後現代主義居主流的當下仍倡導建設性後現代主義倍加贊賞。他在北大主持的“後現代主義研究”講座中，在主編的《後現代哲學概論》專著中，都為過程哲學和建設性後現代主義留有一席之地，這在中國哲學界是一股清流，具有風向標意義。可見，先生的視野是很寬泛和前沿的。

大約從2003年起，我應先生之邀擔任“過程哲學”這一講的授課任務。為了我請假方便，先生給我寄來公函。我所在的軍事交通學院領導看是北大來函，一路綠燈。在近十年時間裏，我無利起早，在沒有一分錢報酬的情況下每年兩次來北大上課，為母校盡綿薄之力，受到先生好評。每次課後，先生都要講評。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對過程哲學要義的精準凝煉：“有機整體、世界流變”。我這個多年研究過程哲學的後生，對先生一語中的的直覺和智慧欽佩有加。課後，我喜歡推着先生的自行車，陪他在校園裏走一會。特別是在冬日夜幕下，看着偉岸清瘦、白發蒼蒼的先生騎車遠去的情景，驀然間

會想起朱自清的散文《背影》或羅中立的名畫《父親》，心中感嘆這真是北大一道靚麗的風景。哲學系是長壽系，先生的年齡雖然不是最長的，但他的教齡應該是最長的。他從1957年留校任教到2018年最後一次上課，在北大整整辛勤耕耘了61年。這不禁使我想起曹操的名句：“老驥伏櫪，志在千裏；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先生治學非常嚴謹，十分注重把哲學和自然科學聯系起來考察，并要求學生盡量閱讀原著。每次來到教室，他總是帶着懷特海的《過程與實在》、《觀念的冒險》、《思維方式》等中譯本，講評時信手拈來，讀上幾句。2006年，我從天津調至北京，不再兩地奔波。2014年，先生找到我，要我校對他的學生們初譯的懷特海的《科學與哲學論文集》，書中涉及大量數學知識。我暗忖，知生莫如師，先生算是找對人了，盡管他并不完全了解我的學術背景。我的家父是教高等數學的，在南大求學時教我們數學的是全國高校非數學專業統編教材《高等數學》的主編黃正中教授（他上課時會在每一個數學概念後面標明它的英文），我的學士論文題目是《馬克思〈數學手稿〉中的哲學問題》，因而我自信能完成好先生交給的任務。這期間，我在單位工作繁忙，家裏父親病重去世，自己也住院手術，但始終不敢忘却和懈怠先生的重托。每次見到先生，他總是囑咐我要注意身體，從不問及校稿的進度，但我從他的眼神中能看出那般切的期望。經過一年多努力，我終於校完這本近30萬字的譯著，許多章節幾乎重譯，并于2017年由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先生對此十分滿意，我也為譯出懷特海的又一部著作而倍感自豪。

今天，我們緬懷恩師，我以為最重要的是學習先生的精神。從我個人的體會看，這種精神可概括為：追求真理、獻身哲學的實事求是精神；低調平實、扎實做事的高尚人格境界；勤耕不輟、跟踪前沿的嚴謹治學風範；傳道授業、釋疑愛生的崇高師德師風；春蠶到死、蠟炬成灰的無私奉獻意識。不知方家以為然否？

（作者曲躍厚，解放軍原後勤學院教授，《過程神學》譯者）

理性的冷峻與關懷的溫度

——評《朱熹與懷特海哲學比較研究》

盧怡

現代化在給人們帶來便利的同時，也帶來了諸如生態破壞、消費主義、人的異化、個體原子化等一系列問題。面對現代性危機我們應當如何作為？要回答這個問題或許可以從最聰明的哲學家那裏找尋啟發。朱熹和懷特海分別是生活在12世紀中國和20世紀英美的哲學家，他們生活的年代與環境有着很大差異，但他們的理論却不約而同地指向了相近的價值旨歸，此種價值旨歸對於應對現代性危機存在着某種意義——王錕教授敏銳地察覺到了這一點。王錕教授的新作《朱熹與懷特海比較研究》一書系統地將朱熹哲學與懷特海哲學進行了對比，旨在運用比較的視野挖掘出朱熹與懷特海哲學中的智慧，開顯出他們哲學的真義，以此為面臨着現代性危機的我們帶來一些啟示。

南宋哲學家朱熹是東西古今最偉大的思想家之一，其學術成就——朱子理學是“集宋代思想之大成”的哲學體系。朱子理學不僅對中國產生了深遠影響，在朝鮮、日本和歐洲也有一席之地。17世紀傳教史上出現的“禮儀之爭”促使西方人開始關注朱熹理學，禮儀之爭涉及朱子對“天”的理解以及朱子哲學“有神無神”的問題，這一爭論是“幾百年來朱子研究的焦點”。20世紀以前，中西哲學比較研究中的朱子研究集中在對朱子上帝觀的探討上；20世紀以來，隨着中西哲學交流日益頻繁，朱子論著也實現了更加系統、準確的外譯，這促使朱子哲學與西方哲學的比較研究得以更廣泛地展開。

近幾十年來，朱熹成為中西哲學比較視域中的焦點，朱熹哲學與懷特海哲學的比較研究層出不窮。然而，以往的朱子與懷特海哲學的比較研究都較為零星狹窄，王錕教授的《朱熹與懷特海哲學比較研究》是首部將朱熹與懷特海哲學進行全方位、多維度比較研

究的著作，具備開創性意義。不知整體則難以把握部分，本書的一大特點在於通過對朱熹與懷特海哲學宇宙論、本體論、認識論、價值論及兩者哲學中諸多重要概念的比較，全面展現朱熹與懷特海哲學的基本特徵，這能幫助讀者從整體上把握朱熹與懷特海哲學，同時促進對部分的深入理解。

中西哲學的融會是可能的嗎？中西哲學的出發點雖不同，然而分別之發展表現出“交合之趨向”（唐君毅），因而中西哲學之融會是有可能的。朱熹哲學與懷特海哲學分屬中西哲學潮流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各自的哲學根源差異較大，但“交合之趨向”甚為明顯。那麼具體而言，朱熹與懷特海的哲學有何異同呢？《朱熹與懷特海哲學比較研究》一書對這個問題做出了獨到而系統的回答，書中梳理了朱熹哲學與懷特海哲學在宇宙論、本體論、認識論、價值論及諸多重要概念之上的契合與分殊，為讀者在比較視域下理解朱熹與懷特海哲學指明了方向。

王錕教授贊賞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其作品也有着韋伯所提倡的那種氣質——一種“理性的冷峻”（劉擎），這種“理性的冷峻”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在各個部分的比較中，作者并非感性直觀地將朱熹與懷特海的哲學進行類比，而是在引用豐富文本的基礎上總結兩者哲學的特點，在此基礎上才進行比較研究，支撐材料之充分使得論證有理有據。譬如在比較朱熹與懷特海的宇宙論時，作者指出朱熹的宇宙論的主線是“以陰陽言造化”，朱子“在宇宙論上主張‘萬物一體說’，認為宇宙是天地萬物與人相關聯、是一氣流通而生成的有機生命整體”。作者擷取《朱子語類》、《朱子全書》中的諸多材料，由淺入深、

層層遞進進行分析，其論證的支撐材料是相當充分的，論證邏輯是相對嚴密的。

其次，作者意識到，在研究懷特海哲學時，伴隨着語言形式經由翻譯這一媒介實現轉換，語言所表徵的意義與內涵容易出現偏差。在比較朱熹和懷特海哲學的重要概念時，在懷特海部分，作者并非貿然地隨意挑選一個概念的慣常譯法用于比較，而是擷取概念的英文原文，將其放置在懷特海哲學的整體語境中進行探討。在本書的第一章，作者對朱熹和懷特海的生平經歷、學術背景都做了系統介紹，這樣做可以將朱熹哲學和懷特海哲學“還原”到其產生的文化土壤中，更加清楚地展現朱熹哲學與懷特海哲學生長的“來龍去脈”。最後，作者沒有犯比較研究中常常出現的牽強附會的毛病，他沒有執着于將朱熹和懷特海哲學中的概念進行一一對等，而是清醒地意識到“雖然兩者大體趨勢相通，各家持有的內容與根本觀念互異，畢竟是來自兩個哲學傳統的東西”。

在“理性的冷峻”之外，作者還兼顧了價值關懷。作者在對朱熹與懷特海哲學進行理性分析之後從他們的哲學中獲得感悟，對人與他人應當怎樣交往、人與萬物應當如何共處提出了自己的見解。這種價值關懷非但沒有消解本書的客觀性，反而成爲本書客觀性之補充。如同作者自己所言：“對研究對象的價值關懷作同情理解並將之揭示出來，才是真正的客觀性研究。”（王錕：學術研究的價值關懷及其客觀性，中國社會科學報，2020-4-28）

馬克思主義將人類社會劃分爲五種形態：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如今，共產主義尚未到來，資本主義仍在快速增長。資本增長帶來生產力迅速增長的同時，還帶來了一系列影響人們現實生活的病癥——我們稱之爲現代性危機。隨着資本主義的增長，市場全球化和生產全球化成爲難以阻擋的趨勢，與之相伴的還有現代性危機的全球化。現代性危機不祇是在某些地區、某些行業、某些領域之中發生，而是在全球範圍所有人羣中普遍地發生。地球上各個國家、各個民族成爲了互聯共通的共同體，人們需要共同面對、共同解決現代性危機。本書作者對於朱熹和懷特海哲學的研究，最

終朝向的便是對於人類現實生活的關懷，他想從兩位大哲學家的思想中汲取智慧，以應對當前人類所面臨的現代性危機。

在“朱熹的‘生生哲學’”一章，作者基于朱熹的“生生哲學”，針對現代性危機提出了自己的主張。作者將當今的現代性危機總結爲“三態危機”，即生態、政態、心態危機。生態危機是環境破壞和生態污染所帶來的危機，政態危機是全球性社會治理危機，心態危機是市場經濟侵蝕下人們物質富裕却精神空虛、肉體膨脹却心靈萎縮之危機。作者認爲，要解決“三態危機”，就必須“放棄碎片化的思維，以統整一貫的視野，對朱熹和懷特海有機主義和生命哲學進行綜合創新而重建一種形而上學”，在此基礎上，作者提出了自己的主張——“一道三態”說。

“一道三態”說綜合了朱熹哲學與懷特海哲學的精神，將生態、政態、心態看作是相互關聯、相互影響的有機整體，用“道”統貫“心態”“生態”“政態”，旨在解決現代社會人類所面臨的現實危機。從方法上看，它超越了主體性和主體間性，可以說是一種“跨主體性”（趙汀陽）的方法——它是在兩種哲學傳統深入交流融會的基礎上所進行的創新。

遺憾的是，作者祇是在本書末尾提及了“一道三態”說，對於“一道三態”說的內在機理未做詳細展開。殷切盼望着王錕教授在融會中西哲學的基礎上，對“一道三態”說做出更多闡發，以“熔鑄新的世界哲學和未來哲學”（王錕：中國哲學的路徑預設，光明日報，2012-1-9）。

“不識廬山真面目，祇緣身在此山中”，比較研究的好處在於登上了“廬山”之側的另一座山，用新的視野關照自身。誠如作者所說，“我們需要通過認識‘他者’而‘迂回’地認識‘自己’”，用跨文化視角來觀中國哲學能夠達到對中國哲學更爲清晰客觀的把握。以中西哲學比較爲契機，通過“他者”視角來實現對中國哲學更爲清晰客觀的覺察，並運用哲學智慧來關懷人的現實生活，正是本書的旨趣所在。

（作者盧怡，浙江師範大學碩士研究生）

生態文明 從心開始

——關於生態文明和自我的深度轉化

裴勇

我始終堅信建設生態文明，人類才會有美好的未來，才能實現共同的福祉。要想把生態文明變成現實，首先需要從我們每一個人的自我、從我們的內心出發進行充分的深度的內在轉化。實現生態文明，必須從心開始！

我的轉變是來自于我對近現代西方工業革命以來歷史的了解，以及我在中國改革開放和發展過程中，以及全球經濟高速增長中的親身體驗。

我小時候看過一部英國電影《霧都孤兒》，我還有一件美國品牌的風衣 London fog。前些年每當我在北京沙塵暴天氣時穿上這件風衣的時候就會想起：從19世紀西方就已經大踏步開始了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歷程，後來西方又把其問題重重的強勢文明下的工業及污染傳遞到世界各地包括中國。像20世紀50年代英國的工業氣體排放導致的倫敦霧事件、日本的工業廢水導致的水俣病，都造成了嚴重的環境生態災難，在短時間內令很多人致死。我生活的城市，儘管近年來改善了很多，但有的河流也曾一度瀰漫着一股臭味，沙塵暴也曾經常會襲來。這些都讓我強烈地意識到，人類必須轉變生產和生活方式，轉變經濟發展的模式，而這後面更重要的是要轉變思維方式，轉變對我們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的態度和認知。否則，我們整個地球人類都要提早面臨滅頂之災。因此，我們必須要向生態文明跨越，因為人類沒有其他選擇！

在實現生態文明的過程中，我們急需要改善現有的狀況，更需要改革我們的觀念、革新我們的思維，實現一場深度的自我革命。我認為，改善 refine，是屬於外在層面的，比如我們可以把污染的火力發電改為清潔的風力發電、太陽能發電，用電動汽車代替燃油汽車，這些固然是好的，有利于環境和生態。但很多人從來不想，我們為什麼需要那麼多能源、我們為什麼要那

麼多汽車，我們為什麼把生活節奏搞得那麼快？

我當年在克萊蒙訪學時了解到，加州有這麼充足的陽光，也很幹爽，但很多人家還是要配備烘幹機去烘幹衣服。為什麼一個家庭要好幾部車？這些難道不是對能源的極大浪費嗎？西方文化實際上是推崇過度的欲望享受和弱肉強食！這個世界創造了這麼多的物質財富，為什麼亞非拉還有那麼多人會那麼窮、會挨餓甚至會餓死？不要總是煞有介事地去那裏做做慈善秀，不要總是不負責任地說他們懶惰落後。他們本可以自給自足地過他們田園牧歌式的簡單生活。

這種極度不均衡也是由于某種文化的貪婪、冷漠和掠奪造成的。所以，我認為，改善是必要的，但不是根本的，根本上還是要改革、革新、革命。長久以來，向生態文明的邁進困難重重。轉向生態文明最大的障礙，我認為就是認識、就是思維方式，具體而言就是以現代性為特徵的西方二元論的對象性思維模式。這種思維方式導致了人的貪欲的無限放大、人與人之間的疏離和爭鬥的放大、人與自然的對立和無休止的攫取和破壞的放大。要想克服這些障礙，關鍵就是要放下上述思維方式和根深蒂固的執念，轉變思維、提高認識，真正找準每一個人類個體以及人類的根本和真正的福祉到底是什麼？在我的概念裏，改革主要是觀念和認知。如何認識這個世界？如何認識人自身？如何把正確的認識傳遞出來，在人們之間達成共識。社會的轉變不會憑空產生，而是源自于人心的轉變、觀念的轉變、思維的轉變，這才是真正的改革、變革！

說到建設生態文明過程中思想觀念的變革，我們需要把視角轉向東方、轉向中國。中國傳統文化和宗教的思想理念可以說是完全生態主義的。以儒釋道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和宗教向來認為萬物一體、人與自然一體。儒家講天人合一，人與人、人與天地都是一

體的，要敬天敬地愛人和一切存在物。道家講道法自然，天地與我為一，萬物與我并生。佛教講衆生平等、依正不二（人與所處環境是一體的），六道裏的衆生都曾互為父母親人。在這樣一種思想觀念下，我們還會去大肆破壞自然、大肆戕害生命、殘害動物嗎？中國傳統文化，不論哪一家哪一派都是主張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也非外于人的存在物，人與自然間并無絕對的分歧和對立，而是互相聯系、相互作用、相互影響。人要服從自然規律。人的自我實現與自然規律和宇宙法則是一致的，人生理想就是人與天地萬物合為一體，從而達到一種完滿和理想的境界，這是中國人文精神追求的最高目標。人也祇有順應天意，遵循自然規律，才能國泰民安，天下太平。

中國很早就有自己的“生態文化”。中國古人很早就認識到，要想利用生物資源，必須注意保護，合理開發，反對過度利用。在中國古代文獻中，既有豐富的保護環境的思想，也有嚴格執行環境保護的法令，還有把發展經濟同環境保護結合起來，使二者互相促進的做法。早在先秦時代，古人就規定春天不準砍伐樹木，夏天不準捕魚，不準捕殺幼獸和獲取鳥蛋；要根據氣候節令，選擇打獵、捕鳥、捕魚、砍伐樹木、燒荒的時間；禁止春天采集剛剛發芽的植物，禁止捕捉幼小的野獸，禁止毒殺魚等等舉不勝舉。

中國人的人生理想和幸福觀，主要是追求一種樂天知命的安足的生活，而不是無限制地放大欲望、攫取自然、侵奪他人。舉一個例子，中國人發明了火藥，但主要用來制作鞭炮，創造歡樂喜慶。西方人拿到中國火藥配方，却用來大規模制造殺人武器槍炮、以便更有力的去掠奪別人的土地和財富！這難道不是文化和思維的區別嗎？生態文明不就是要善待自然、善待動物、善待他人、善待萬物嗎？如果你能減少不必要的貪欲，努力去做無我利他，學會尊重，努力創造人與自然、人與人的和諧共生，努力建立人類共同體，那就離生態文明越來越近了。如果用一句佛教的話來講，就是“熄滅貪嗔癡、勤修戒定慧”。在個人和社群領域都能做的這十個字，我看離生態文明就不遠了，也就可以實現人間淨土了。

我們長期被這世界的強勢主導力量禁錮在一個他

們設定的體系之中，我們的思想和行為同時長期被禁錮，這個強勢主導力量長期所推行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理念和政策是造成目前環境生態問題的主要原因，也是造成社會不公和國際政治動蕩不安的主要原因。所以，我們必須有獨立思考的能力，以及超出現有固化體系的更高的智慧和思維想象力。我們祇有打破思想的枷鎖，我們才能取得突破，走向新生。我們已經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最早從文藝復興以及歐洲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最晚從19世紀工業革命發端的當前的世界政治經濟體系是由西方近代文明所塑造的，而且被認為被宣揚是文明的、進步的。可這樣的文明到底是文明，還是實際上是野蠻？由于這種文明的強勢，導致其他文明無論情願與否都被動地或被武力幹預或被脅迫而卷入其中，大家無法選擇，而最終這種文明導致了當前國際秩序的不合理和生態災難的惡化。如果讓我問，我要問的是，這個世界體系、這個發展方式合理嗎？能夠持續嗎？我們為什麼不能從這樣一個桎梏中解脫出來，我們為什麼不能轉變我們思維和認識？儘管控制者很大程度不想讓我們解脫出來，但我們至少要想出來并為之努力！

我認為，我們共同去建設并實現生態文明是大有希望的，因為我們還有古老高超的中國傳統文化、還有深刻理智的過程哲學和建設性後現代思想這些寶貴的精神財富和思想資源。過程哲學和以此為基礎的建設性後現代思想有一些標誌性的特徵，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反對二元論，主張整體有機論，認為宇宙是一個有生命的整體，處于一種流變的過程中，并且相互聯系。世界的發展是一個開放的體系，是一個不斷演化的過程，二、在人與人的關係上，擯棄激進的僵硬的個人主義，主張通過倡導“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和“關係中的自我”（self in relation）來消除人我之間的對立。三、在人與自然的關係上，主張人與自然之間是一種動態的平衡關係。自然不是人的徵服對象，人與自然應該和諧共處，因此主張生態主義。在方法上這種學說主張：四、運用綜合性的思維方式。五、采取多元主義，主張對話和互補。六、不應簡單地否定（現代性），而要着眼于揚棄和“去執”。儘管我的概括不一定十分

準確，但以上大致可以概括建設性後現代思想和生態文明的最基本的特徵。

同時，柯布博士也曾表示：“過程哲學、建設性後現代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有很多的相通之處”。中國傳統文化和宗教中眾多的思想元素，完全可以認為是當代建設性後現代思想和生態文明建設取之不盡的精神養料和思想寶庫。我熱愛并相信我們中國古老的傳統文化蘊含着宇宙人生的真理，能把我們人類引向真正的自由和超越。儒家教給我們人與人相處之道以及對天地自然的敬畏。道家教給我們人與自然相處之道以及天地萬物的和諧統一。佛家教給我們人的身心和諧之道，教給我們緣起性空、眾生平等、慈悲無我的超越智慧，

真正打破人的局限，而走向徹底的覺悟解脫。

我要把這些觀念和智慧傳遞給他人和所有需要的人，促進大家一起努力建設生態文明、努力建設一個更好的能讓我們身心自在的人類家園。我認為這兩方面，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理念與過程哲學和建設性後現代思想的結合，將足以為生態文明提供有力的思想資源和思想武器，這將是創造未來人類生態新文明的偉大力量源泉，也是我的力量源泉。我們每一個人都要努力成為生態文明虔誠的守護者和實踐者，在生活實踐過程中共同去創造生態文明這一人類的新希望。

（作者裴勇，華夏文化基金執行主任）

教學理論研究領域的懷特海之光

——評楊麗教授著《走出困境之希望：有機教學理論》

王寧

教學理論研究是教育學領域的經典議題，伴隨着新課改的每每推進，不息的學術生力在這一領域持續涌現。誠如石中英所說，“教育學是一個開放的知識領域”，作為教育學分支下的教學理論研究自然承繼着這種開放性，來源于哲學、心理學、社會學等諸多學科的影響都在教學理論研究的發展歷程中展現出來，同時也帶來了諸多爭論。

在21世紀初，這些爭論主要集中在與本質主義及反本質主義相關的問題上。這些爭論的存在導致學界開始逐漸探索解決路徑，并生成出諸種解決思路。歷經多年探索之後，不少學者發現，或許調和本質主義與反本質主義的道路，即走“融合”之路是最為可行的。正是基于學界對於“融合”本質主義與反本質主義的這樣一種探索，楊麗教授立足于英國哲學家、教育家阿爾弗雷德·諾思·懷特海所創立的有機哲學體系，從其認識論出發，力圖為一種具有“更大包容性、更強指

導力的教學理論”的誕生賦予可能路徑，這便是本書生成的根本要義。

一、遠與近——有機的研究線路

遍觀本書，可以發現，本書的第一大新穎之處便在于所使用的研究線路，不同于傳統意義上教育學研究所普遍應用的質的研究或量的研究。本書所奉行的研究線路是一種呈現為螺旋回歸的線路。書中寫道“本書通過遠（理解模式）近（知識觀和認識論）兩條線路展開論述”，將“理解模式”與“知識觀和認識論”分別作為這條螺旋線路的兩邊，二者相互彌合、相對獨立，共同組成一種有機的研究線路，從而為本書的深度推進持續賦能。與機器學習的螺旋回歸算法所具有的處理高維數據集、找尋數據集中的非線性關係、處理缺失數據以及泛化等優點相似，本書的研究線路可有力找尋“理解的既定模式”內外的諸種經驗，在情感性的基礎上審

視知識觀和認識論的確定性因素與非確定性因素，進而運用“心靈與身體、事實與價值、守恒與變化統一的認識論”路徑，完成理解模式與知識觀和認識論的雙向玉成。

二、本質與反本質——有機的邏輯與梳理

本書的另一大優越之處就在于，楊麗教授將整本書的邏輯綫索交代得十分清晰。遍覽全書，可以發現，本書自行文伊始便沿着十分嚴謹的邏輯綫索進行推進。第一章將自1903年起的中國教學理論研究內容按歷史階段加以梳理，並明確對目前教學理論研究的直接影響來源于本質主義知識觀和認識論以及反本質主義知識觀和認識論。由此展開後續章節對於本質主義知識觀和認識論背後的實體哲學與反本質主義知識觀和認識論背後的解構後現代哲學，以及二者對於教學理論研究所產生影響的討論。但由此而來的這兩種教學理論各有其弊病並由此引發學界的種種爭論，因而越來越多的學者提出要追求“守恒與變化、事實與價值、科學與人生、理智與情感、永恒與歷史邏輯與直覺之間的‘和合’或‘合作’”。這正與懷特海所創立的有機哲學的根本追求不謀而合。楊麗教授便在這個意義上生成最後三章，由此完成本書的邏輯閉環。除此之外，楊麗教授在書中將本質主義教學理論與反本質主義教學理論生成之基礎——實體哲學與解構後現代哲學交代得十分之清晰，有關這兩種教學理論的內容以及發展歷史也梳理十分細緻。如此細緻與全面的梳理、如此清晰與了然的剖析，不可不謂之歷史功績也！

三、有機教學理論——深刻的批判與有機的調和

一直以來，我國的教學理論研究深受實體哲學與解構性後現代哲學的影響，在二者之間圍成困境。習近平總書記于2016年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強調，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要把握好“馬克思主義的資源；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資源；國外哲學社會科學的資源”三方面資源。這為我國目前的教學理論研究破境提供了根本的方法論，而本書便是一次將普遍的方法論下降到具體學科、具體實踐的嘗試之舉，這也正是本書的第三大優越之處所在。在本書中，楊麗教授基于懷特海有機哲學體系分別完成了對實體哲學的審視以及對反本質主義認識論的批判，並在此基礎上對二者

加以調和。非常有趣的是，就對實體哲學的批判這一點來看，儘管邏輯實證主義、現象學、解釋學等哲學對於實體哲學也普遍持有批判的態度，但這些哲學往往將他們的目標更多地集中于或認識論、或方法論等某一個哲學領域，很少有如懷特海的有機哲學這般覆蓋全面的；除此之外，有機哲學對實體哲學以及反本質主義認識論的這種批判也并非全盤的否定，而是首先肯定了二者的有效性與歷史功績，隨後言明其發揮效用的範圍的限制性，並由此展開批判以及對二者之間的調和的，這與馬克思的實踐唯物主義哲學所奉行的揚棄觀殊途同歸，由此也更加構成本書生成的時代性與合理性。

結語

這本《走出困境之希望：有機教學理論》立意宏大，着眼于我國教學理論研究發展之未來、又緊扣實際，始終貫徹黨中央的重要指示，未來足以成為一本教學理論研究領域的經典之著。書中有關本質主義與反本質主義的批判與思考，既辯證又犀利，在深度剖析二者弊病自成的哲學基礎上，深入理解模式與知識觀和認識論兩個領域之中加以剖析，並時時緊扣具體的教學理論研究歷史與現實，在共相與殊相中達成平衡。

然而，此書也絕非完美無瑕。普遍認為，對西方哲學的研究內容可以劃分為四個部分，分別為“本體論”“認識論”“價值論”“方法論”，楊麗教授在本書中也承認了這一點。但遍觀本書可以發現，楊麗教授在本書的生成過程中有意地回避了有關價值論方面內容的討論，然而在教學理論中目標、評價、標準等內容均與價值、價值觀、價值取向這些從屬於哲學價值論部分的内容緊密相關，本書中這部分内容的缺失，不可不稱之為一種遺憾。除此之外，本書最後所生成的有機教學理論仍缺乏諸如“教學的概念”、“教學過程”、“教學方法”等具體的理論内容，這就未免使得本書的結尾給讀者一種意猶未盡之感。

總而言之，《走出困境之希望：有機教學理論》是一本深刻洞悉教學理論研究困境根底、引領領域未來的真正好書，此書的問世是教學理論研究領域的幸運，同時也是我國教育話語體系構建的一種可能！

（作者王寧，哈爾濱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博士研究生）

建設性後現代主義 與中國式現代化的生態文明建設

佟金丹

自從18世紀進入工業文明以來，人類對生態環境的破壞日益嚴重。糧食問題、能源問題以及全球性的環境危機等問題的出現給人類敲響了警鐘。面對日益嚴重的全球性生態危機，建設性後現代主義思想家們開始重新思考人與自然以及整個世界的關係。建設性後現代主義以有機整體論的思維方式重新審視人與自然的關係，提出了一套兼具批判性和建設性的全新哲學思想體系，尋求人與自然之間的動態平衡，謀求人與自然的共同福祉。

產生于20世紀70年代的建設性後現代主義，以懷特海的過程哲學為基礎，創造性地提出了有機整體論的世界觀，超越以往西方哲學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秉持一種建設性的有機整體思維方式。1973年，小約翰·柯布博士及其學生大衛·格里芬博士在美國克萊蒙特創立了過程研究中心，該中心致力於過程哲學思想的研究及其在社會發展各領域的廣泛應用。柯布博士早在1971年就開始反思生態問題，其成果《是否太晚？》是世界上第一部生態哲學方面的專著（樊美筠、劉璐、高凱歌：《柯布與中國》）。大衛·格里芬博士以懷特海的過程哲學為基礎，提出了“建設性的後現代主義”思想，並致力於建設性後現代主義思想在社會、經濟、政治、文化、教育、科學技術、生態文明等方面的推廣和應用，在世界範圍內和當代社會發展的各個領域產生了比較廣泛的影響。

西式現代化是建立在工業革命的技術革新和以往西方現代哲學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之上的，在此過程中人與自然被視為對立存在的主體和客體。在農耕文明中被感恩的地球母親，在工業文明和商業社會中，成了人類掠奪資源和排泄垃圾的對象。人類忘了維系自己生存的基本食物和環境等還是依賴地球母親供給的，狂妄到以為可以對地球母親肆意妄為。以西方資

本主義國家為代表的現代化發展方式，是一種蘊涵着自我毀滅基因的發展模式。它無節制地掠奪自然資源、嚴重破壞地球生態環境，如果照此模式繼續發展下去，距離人類的末日和地球的毀滅也就不遠了。

對於當下人類面臨的生態危機，作為一位富有使命感和慈悲心的世界生態文明運動的領軍性人物，美國人文與科學院院士、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創院院長小約翰·柯布博士，在每一刻都盡己所能、身體力行地去做生態文明運動的倡導者和踐行者。柯布院士認為人類和地球是共生的關係，作為一個共同體，所有人都應對包括自然界在內的萬物福祉負責。柯布院士指出：“人類是自然的組成部分，而且我們和自然的其他部分的關係與我們和他人的關係一樣是連續不斷的。”（大衛·格里芬等：《超越解構：建設性後現代哲學的奠基者》）他強調我們要用有機整體的思維方式來認識世界，超越機械僵化的二元對立的西方現代化思維模式的弊端。柯布院士指出：“建設性後現代主義對解構性的後現代主義的立場持批判態度……我們明確地把生態主義維度引入後現代主義中，後現代是人與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時代。這個時代將保留現代性中某些積極性的東西，但超越其二元論、人類中心主義、男權主義，以建構一個所有生命共同福祉都得到重視和關心的後現代世界。”（《為了共同的福祉——約翰·柯布訪談》，《上海社會科學報》）

縱觀人類發展史，工業化進程中人類對生態環境的破壞是一個通病。柯布院士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開始憂心工業文明發展導致的日益嚴重的生態危機，並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生態哲學專著《是否太晚》，呼喚社會各界共同關注生態問題。然而他的呼聲在美國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却並未引起強烈的回應。其時，20世紀70年代的中國仍是農業經濟為主的發展模式，生

態問題還未凸顯。中國用30年的時間構建了自己的工業化體系，尤其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等利好條件使得中國經濟駛入快車道，獲得騰飛式發展。但與此同時，工業化發展導致的生態環境惡化等問題也開始凸顯出來。

當前中國正處在全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中，通過了解西方現代化過程中的經驗教訓，可以規避西式現代化的一些弊病，少走彎路，避免重蹈覆轍。大衛·格里芬說：“中國可以通過了解西方所犯下的錯誤而避免現代化惡果，當中國這樣做時，就已經是後現代化了。”（大衛·格里芬：《後現代科學——科學魅力的再現》）面對日益嚴峻的生態問題，中國政府開始重視并采取切實有力的措施進行生態文明建設。2007年召開的中共十七大在報告中明確提出：“要建設生態文明，基本形成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消費模式。”2012年，十八大報告再次明確提出要全面落實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2017年，十九大報告進一步明確指出：“建設生態文明是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千年大計。”2023年，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特徵之一就是致力於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中國從2023年開始將8月15日定為全國生態日，以紀念習近平總書記于2005年8月15日考察湖州市安吉縣時首次提

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科學論斷。中國政府時刻牢記“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綠色發展理念，把生態文明建設作為關係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根本大計，并融入國家的制度、政策和文化之中。

建設性後現代主義的有機主義世界觀與中國政府倡導的生態文明建設，都致力於建設一個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美好世界，建設性後現代主義的倡導和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產生了高度的同頻共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代表廣大民衆利益的社會主義的中國政府一直在踐行着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承諾，從制度體系建設、部門協同合作、推動發展方式綠色低碳轉型、倡導綠色低碳生產生活方式等各個方面，切實有序地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生態文明建設，以求為子孫後代留下山清水秀的生態空間。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決策的目標是壟斷財團的資本獲利，正是資本對利潤的無節制追求導致了現今的生態危機、金融危機和貧富兩極分化等問題，資本逐利和冷血的本性決定其關注點不可能是普通民衆的福祉。作為全球50位杰出思想家之一、被稱為“生態聖哲”的柯布院士在中國政府生態文明建設的政策與行動中看到了世界和人民的希望，由衷地發出感嘆：“生態文明的希望在中國！”

（作者佟金丹，山東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員）

真實的謊言（二）

——朱玲愛和她的江蘇溧陽農村養老模式

蕭逸林

二

這時護工陸續抵達小院。大工孫大姐、小工時大姐還隨手帶了幾把從自家地裏新摘的蔬菜，送進廚房裏，以備午飯。

小院實行大小工匹配制。即大工領導若干小工護理小院失能老人。所謂大小工類似于過去中國農村的長短工。雖說勞動面前人人平等，但是其工作內容、工

作時長和待遇大有不同。

以大工孫大姐為例。孫大姐現年55歲，本村人士，負責愛心小院十名失能老人幾乎所有重要的護理工作，包括所有的臟活、累活以及老人的情感撫慰，相當于護理組長。工作時長24小時。工作一天，休息一天，上半月休半月。

小工時大姐，60歲，本村人士。嚴格來說，時大

姐已經是老人。她的工作是為大工打下手，負責小活、輕活，工作時長從一小時到八小時不等，較為自由。拿計時工資，但最高不高于大工工資的一半，也就是每個月 2500 元左右。而時大姐往往祇上半天班，也就是 4 個半小時，每月領薪 1500 元。因為中午、下午還要照顧留守在家的小孫子、失明的丈夫，還有 80 多歲的公公婆婆，還要照顧自家的地。而她本人却無人照顧。對一個全家養老金加起來不足 2000 塊錢、負擔又很重的農村婦女來說，工作半天，一月 1500 塊錢的打工，既可以照顧家庭，又可以解燃眉之急。所以，時大姐很知足，也很珍惜。也有很多類似的老年農村婦女想進小院打零工，貼補家用。遺憾的是，朱玲愛莫能助。她自己還要在外面兼職打工，才能保證家庭和小院的正常開支。

最鬧氣的時候，三名大工每人匹配兩名小工。養老院解散後，祇剩下一名大工和兩名小工，再加上朱玲愛，輪流護理 10 名失能老人的日常起居。

朱玲愛創立了一種類似豐田細胞式生產方式的微團隊合作模式，或略勝一籌，雖然她對豐田模式一無所知。按照她的設計，以大工為主管，匹配兩名小工，就可以匹配三個微觀護理中心，輪流照料 10 到 15 名老人。而兩組微團隊相匹配，就可以輪流照料 20 到 30 名老人。由此可以推廣到 N 個微團隊匹配 N 個微觀護理中心，并輪流護理。

匹配是這種模式的靈魂。它的好處是：輪流工作，輪流休息，機制靈活，相互照應，收入增加，在輪流互換中，所有護工身心都能得到及時恢復和調整。同

時也能相互監督，避免出現虐待老人的情況。

在朱玲愛看來，要想讓護工愛老人，首先必須愛護工。祇有真心實意、設身處地地為護工着想，為護工的收入着想，為他們的身心健康着想，護工才會真心實意、心無旁騖、主動熱情地為老人服務。憑借這獨一無二的合作模式，她甚至設想，祇要有一小筆投資，江蘇溧陽模式就可以迅速推廣，到那時就可以采用合伙人制。這樣就能既保持靈活多變的小規模優勢，又可以遍地開花，不知可以帶動多少農民就業上崗，并最終惠及整個中國農村。

這種以大小工匹配的微觀合作團隊為基礎，以微型護理中心為基本養老單位，以匹配、互助、合作為基本機制、依托遍布農村的微型護理中心，小規模運營、遍地開花的互助養老、合作養老的模式在中國農村養老產業中前所未聞。

這就是江蘇溧陽模式。

這就是朱玲愛為中國農村養老事業做出的、獨一無二的貢獻。

遺憾的是，這一模式目前還僅限于小院，但足以迸發出中國大多數養老機構所不具備的活力。如果說江蘇溧陽模式到底有什麼起色，那就是比一般護理機構更加精細、更有耐心、更主動、熱情、友善。

一句話，更有人味兒。

（未完待續）

（作者蕭逸林，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博士，獨立學者）

身體是走向樹木的秘密通道

——“生機舞動”工作坊後記

劉宸彤

從來，我們都堅信樹木與我們之間存在着巨大的生物隔閡。達爾文進化論的知識告訴我們，也許我們從同一個真核生物演化而來，但那已經是遠古的事了。

時間與進化的觀念就這樣在我們腦海中，在我們與樹木之間設置了一道隱形的屏障，于是我們帶着這種默認，這種與自然科學的契約，路過每一棵樹，穿過甚至毀

滅每一片樹林和草叢。

我們也許從未想過如何到達一棵樹的世界。樹木會說話嗎？會思考嗎？有自己的語言嗎？我們也從不去想這些問題。因為我們認為，樹是比人類更低等的生命；你看，我們所說的“低等”，又是生物學的術語，這一套思維過于自然順滑以至于不會引起任何的摩擦使我們警覺。

以上，都是觀念上的，而身體呢？也許在同一時間，我們離自己的身體也越來越遠了。我們無比地信任意識，全權將身體交給頭腦中的念頭。聽“我”想聽的，看“我”想看的；在全部交給意識之後，我們也就放下了對肉身感知的捕捉。頭腦總是想從外部抓取信息，外界成了全世界，身體成爲外界信息的集裝箱。于是，身體想說什麼時，我也不會再聽到。祇有當肉體的能量耗盡，它使用種種肉體不適刺激我們，才能點醒那個還在外部尋覓的頭腦意識。

爲什麼要試着抵達一棵樹？這是我參加 Myra 老師的“生機舞動”工作坊之初沒有思考過的。我祇是想要通過 Myra 老師的全新形式的舞蹈，獲取一種新的攜帶身體的方式。也許，答案是在體會的過程中才能够顯現，而體會，總歸要回到身體的。

工作坊爲期一天，包含“身體訓練”與“尋樹化舞”兩個部分，在上午的“身體訓練”部分，Myra 老師首先帶每一個人打開身體。整個上午的內容編排是在指引我們放下那個“意識”，那個意識會在平常時時審視和評判着我們的行爲，即便我們的言談舉止都符合常規；但也正是這個意識阻礙着我們與外界萬物的互通，因爲是它在分別、審視、批判和質疑。Myra 老師指引我們用身體的肢體語言進行介紹，或通過她的指令做出行爲反應，或去扮演身體雕塑，并基于對“身



體雕塑”的感知，用自己的身體語言做出回應，種種像遊戲一樣的訓練，就是在幫助我們放下那個時刻想要讓我們趨向“正常”的意識，因爲當它停下來，身體的開關便隨之打開了。

我雖然嘗試過以冥想打坐來清空意識、修復身體，但當三十多個人聚集在空曠的場地中，我的身體便不再僅僅是我自己的了。Myra 老師告訴我們，她不施加指令，而是讓我們跟隨着人群。當有一個人停下，所有人都要停下來，當有一個人開始走動，所有人都開始走動。這時我便能更清晰地感知到個體是如何在群體中存在的。在那個時刻，所有人都擁有了同一顆心臟。我們像遷徙的鳥群，擴張又聚集，時疏時密，停滯又流動，循環往復；但又不同于鳥群，沒有固定的領隊，每個人都可能成爲帶領群所有人啓動的開關。在所有人都默言的巨大會議廳裏，腳步聲變成一顆石子；一顆石子落下，整片水面都被激起漣漪。我甚至不用抬起頭，哪怕是處在出神的狀態裏，不需要刻意地控制，身體也可以自然而然地停止或啓動。

在這樣的時刻裏，我便立刻明白了我們每個人與其他人的關係是怎樣的。我們每個人都不再是孤立的，我們時時刻刻處在其他人的關係當中，就像每個細胞都屬于整個人體一樣，作爲一個細胞，我們無法看到身體的全貌，但這不意味着我們與身體脫離關係。我們時時刻刻都處在與他人的關係當中，就像我們身體的每個細胞時時處在與全身細胞共通的無形網絡中。這一網絡雖不可言說、不可描繪，但可以通過身體的觸角感知。

也許不祇是與其他人在共在，我們與我們所在的外部世界的關係，也始終處于意識捕捉不到的交錯共振當中，就好像當我在夏天無數次地經過美術館後的那棵黃桷樹，它的枝葉已經無數次地爲我擋住烈日，幾次淋着小雨路過樹下的時候，也暗自心生感激，但始終也沒有仔細看看它的模樣。我們也許因爲太渺小，所以祇會看到它的陰影，而忘記看一看它的磅礴身軀。

我們需要找回那些被忽視的交錯共振，因此下午“尋樹化舞”部分的第一步，就是在校園裏尋找那些被我們遺忘的樹木。在工作坊主持人靳力鵬老師的帶領下，我們去拜訪那些“老人”，它們已經駐足在這片土地百年之久，有的已經僅剩下尸骨，有的還在努力地擴張，有的正在享受結完果實之後的滿足，有的老態龍鐘，但還算身體健碩，有的人看到樹木根部像血管

一樣的中空結構，有的人看到樹皮上凸起的小刺，有人看到樹洞中的螞蟻，很多平常未被發現的驚奇，在我們走進樹木的時候被顯現。而這還僅僅是我們走進樹木的初試一步。

在拜訪過那些校園裏的老樹過後，Myra 老師帶領我們回到場地，進入到“尋樹化舞”的第二環節，我們跟隨着音樂，用身體表達一棵樹——我們可以成爲任何一棵想成爲的樹，我們可以用任意的肢體語言去表現一粒種子從土壤中蘇醒，再從空氣中萌發，直到成爲我們想要成爲的那棵樹。由此，我們的身體與那些樹木便建立了聯結，我們用全部的感官去感受和體驗，每一個細胞都變成了樹木的細胞，我們的腳開始更堅實地踏在大地上，就像樹根深入土壤，空氣也變得像土壤一樣爲我們提供養分，時間在身邊流淌，十年、五十年、一百年、三百年……在這一過程中通過感知與觀想，去體會一棵樹眼前時間的彎曲和折疊。當我們成爲樹，便會發現人類的渺小，那些在我們看來焦慮、緊張的事情是多麼無足輕重。我們成爲樹，也就擁有了樹木的胸懷和眼界，用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已經超越了單純的體驗，而是通過肉體的經驗，獲得靈魂的超越，因爲身體會告訴我們全部關於樹木的以及關於宇宙的秘密。

也是通過這場身體的實驗，我再一次驚嘆舞蹈的力量。舞蹈是連接肉體與靈魂的共振的形式，我們的身體成爲內在振動的外在顯現。這裏所說的是“共振”，而不是單向度的傳遞關係，身體的行爲也會給靈魂以啓發，在扮演樹木的過程之中，有很多肢體的動作是直覺式的、下意識的，但這些動作會給予我們靈魂上的

觸發。例如當我扮演的種子已經破土，當我已經挺直了脊背開始向四周延伸，我的手臂張開、高舉，以某種下意識的方式蜿蜒或挺直、向下或向上，在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一棵樹的形態是如何形成的——現實中的一棵樹，一定也經歷着和我一樣在摸索中延伸的過程，這邊有其他樹木的陰影，那我就向旁路生長，這裏有人類的建築物阻擋，那我祇好收回我的擴張。這便是一棵樹的意識，而這種意識的軌迹，祇有當我們真正試着去成爲一棵樹的時候才會在意識中顯現出來。

這是一場生命之間的交互實驗，我們的身體與樹木組成互動裝置；這場實驗讓每一個人都成爲通靈者，我們接收那些來自樹木生命的訊息，但也是來自天地的訊息；這是一種生命的共振形態，它可以算作儀式，但却是超越宗教的，因爲這裏沒有教義或規範，祇有生命力在每個人身體中自然地流淌；它可以算作藝術，但也可以超越藝術，因爲它承載着萬物的靈氣與生命的力量。

文已至此，距離這次身體的實驗已經過去有些時日，但那些觸動還在醞釀，就像當我走進寺廟，我會不自覺地被那裏的古樹吸引，甚至產生和他們擁抱的衝動。我看着他們凋落的樹皮，強勁的樹根，還有從樹皮中滲出的油脂，便能一下子進入到那股生命力的涌動之中。這樣的情緒摻雜着感動和慰藉，也許這便是我們的生命與樹木的生命發生交織的時刻。

（作者劉宸彤，四川美術學院藝術人文學院 2022 級碩士研究生）

賈平凹小說的生態意識

薛忠文

賈平凹是中國當代文壇著名作家，是“文學陝軍”的中流砥柱。賈平凹深受道家 and 老莊思想影響，他的小說中蘊藏着深邃的生態意識。

賈平凹在思想上崇尚自然的自在性，追求人與自然的高度融合，他對自然有着深深的迷戀和敬畏。這種迷戀和敬畏使他很早就關注生態問題，他的作品中也透着

深層的生態平衡傾向。他早期的商州系列小說中就體現着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小說《金洞》中，作者一面描寫狼的凶狠和殘暴，一面又描寫了村人對狼群肆意殺害而引起的生態失衡，結果導致莊稼被大量繁殖的野生動物糟蹋。自然界中的萬物即對立又統一，它們之間形成了無法割裂的天然生物鏈。在《天狗》和

《浮躁》中，作者多次寫到民間流傳的習俗，在文化形態上闡釋了人與自然之間的內在聯繫。他的許多小說還借用神話動物進行敘事。在動物敘事中運用神話傳說有着得天獨厚的優勢，動物本身就具有神秘感，而且還帶着讓人着迷的故事韻味。《懷念狼》中很多的神秘意象就來自於民間的神話故事。落腳在這片神秘獨特的商洛地區，作者充分利用自己豐富的生活經驗和常識積累，運用了很多有關狼的傳說。這一切都為了說明一件事：生態需要保持平衡，不可偏頗。

賈平凹的小說具有剛健的生命意識。賈平凹成長的環境中流傳着很多關於狼的傳說，他把這種神秘的民間傳說揉進深邃的生態意識中。他在作品中涉獵了很多關於狼的故事。《懷念狼》在取材上汲取了民間傳說的養分，小說中濃墨重彩地描寫了人與狼相互鬥爭的事件，生動地揭示了生態失衡所帶給人類的生存危機和精神危機，以及在此過程中展現的帶有原始動物剛健的生命意識。狼是一種凶猛的極具野性的動物，在作家的筆下是代表生命力的藝術符號。在追求生態文明的過程中，人類總是離不開充滿野性的狼。魯迅在《摩羅詩力說》中說：“蓋文明之朕，固孕于蠻荒，文明如華，蠻野如蕾，文明如實，蠻野如華”，深刻地說明了文明與野蠻生命力的關係。作家不一定是哲學家或思想家，但他創作的作品必然是傳達了一定的哲學精神的。狼，作為一種象徵性的存在，象徵了人類原始的生命力。它那矯健的身姿、旺盛的生命力讓人感受到強烈的衝動，以“懷念狼”為小說命名其實是懷念這種即將褪色的生命力。在《懷念狼》小說中，為保護瀕臨滅絕的狼，政府頒布禁捕法令，以此為引綫，“我”以保護環境的目的為僅存的15隻狼拍照。在此期間上演的獵人與狼爭鬥的故事，說的其實是生態平衡萬萬破壞不得。

在西京城中生活的“我”得了某種“文明病”，生命如冬季泥土上的一片落葉，腐敗得祇留下一圈再也撿不起來的脈網了，但是狼的存在激起了我對生活的渴望。而“爛頭”和“傅山”在與狼的周旋過程中也喚起了日漸萎靡的活力。通過人與狼的對抗，使人和狼各自因為對方的存在而強悍。在與狼的鬥爭中人的生命力被激發，狼也因為人的狩獵變得更加凶猛。原始生命力也展現在“舅舅”身上，使他成為英雄。他有膽識，槍法過硬，而這種生命力祇有在於狼的“交往”中才被挖掘。在自然生態平衡建立的基礎上，人

的精神生態才得以依附，狼的減少乃至消失意味着打破了人與自然的生態平衡，人便失去了原始生命的動力，也就有了“舅舅”等人變為狼人的結局。賈平凹說：“人是在與狼的鬥爭中成為人的，狼的消失使人陷入了恐慌、孤獨、衰弱和卑鄙，乃至於死亡的境地。懷念狼是懷念勃發的生命，懷念英雄，懷念世界的平衡。”作家懷念狼，贊美狼，是基於對人類終極命運的思考，也是懷念與呼喚人的強健的生命力。作家是藝術家，小說不是宣傳口號，賈平凹小說的生態意識更隱晦、更深刻，更有說服力。

賈平凹小說具有原始生態的自在性。賈平凹小說疏淡、典雅，不刻意說明什麼。他的審美藝術觀念裏浸染着深厚的中國古典文學本體論的色彩。古典文學在解釋藝術創作發生時總是把自然放在醒目的位置。王昌齡說：“自古文章起於無作，興於自然，感激而成，都無飾練，發言以當，應物便是。”劉勰在《文心雕龍》中也強調自然在文學中所占有的重要位置。早期賈平凹創作的小說風格是清新自然、詩情畫意的。作品中大都會有幽靜的山川河流，純淨善良的女孩兒，清新流暢的語言和韻味悠長的意境。這種創作風格奠定了作家鄉村風俗畫家的地位。對自然的痴迷使得賈平凹關注生態的自在性。新時期小說創作中關於自然的主題，通常是歌頌自然來作為人類情感的寄托。賈平凹另辟蹊徑，不再祇是謳歌自然，而開始關注人與自然的共生和諧，自覺不自覺地關注生態平衡的主題。早在1982年創作的《山坳》中就涉及了生態的主題。寫順叔與狐狸之間的鬥爭。生存的狐狸少了，順叔的精氣神也隨之少了。狐狸的狡猾和機智是因為有順叔這樣優秀的獵手，而順叔的氣力和精神也是因為狐狸的存在。《廢都》中的人類精神世界是臟亂不堪的，而來自終南山的牛的世界却是聖潔的。《高老莊》中寫的是離開家鄉的人再回去時的變化，寫到人種的退化，也是在用象徵的手法暗示了人與自然的疏遠。

賈平凹作品中動、植物皆有靈性和神性，它們能讀懂人的情感，和人類相處甚好，並且用審視的眼光思考着人類世界。面對人類的各種退化，它們用原始的自在性喚醒人類精神生態的回歸。透過欲花亂人眼的故事，看到後面隱含的深意，一種豁然開朗的情懷撲面而來。

（作者薛忠文，山東社會科學院文化所副研究員）

說有機話，做生態人

——聽王治河教授有機語言學講座有感

盧明艷

著名生態哲學家、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王治河博士于2023年10月21日為我們重慶交通大學外國語學院師生做了一場題為“生態文明呼喚一種有機語言學和體認語言學”的學術講座。我有幸聆聽了這場精彩講座。

其實，剛聽到王治河教授要來我校的消息的時候，我還坐在李翠英老師的辦公室裏和同學們分享近期的學習進度。當時祇知，本周六會有一位最近正在參加“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的厲害人物將來我們面前，開一場學術講座。說來慚愧，作為一名學語言的學生，這時候，我對這位教授以及他所分享有機語言學還一無所知。

陽光明媚的周六，這場講座如期而至。我和同學帶着前一天晚上從南岸校區取到的小相機（用于錄制講座），提前來到開講座的教室。一進門，發現教室裏的人還寥寥無幾。就在這屈指可數的人裏面，有一位穿着紺色西裝打着紅色領帶的先生，不用猜便知，他肯定是王教授。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同學們陸續入場，講座于上午九點正式開始。剛開始的時候，我的注意力還在錄制視頻的小相機上，沒有全神貫注地聽王教授的分享，在此真是要說聲抱歉。慢慢地，我開始注意到，王教授雖然是一個“百度”上的人物，但并沒讓人感覺像個學究。他言談風趣，始終面帶微笑。在我看來，這樣的人所做的學術分享是很有吸引力的。

我開始逐漸進入王教授話語中的有機語言學世界。在介紹了中國的過程哲學之後，王教授提到了第一次啟蒙的局限，其中包括對自然的帝國主義態度、對他者的種族主義態度、對科學的盲目崇拜以及對民主的均質化理解。讓我印象最深地是“對自然的帝國主義態度”這一表述。在我的認知世界裏，“帝國主義”往往和“侵略”、“壓迫”、“剝削”和“腐朽”之類的話語相關。然而，對自然施以帝國主義的態度，就好似把自然放在了比人類本身級別低的位置（當然，這樣的表述在潛意識裏好像也沒有平等地看待事物，這或許也是我需

要繼續探索、追求進步的地方），為了欲望中的美好未來——一個便捷又智能的理想世界，人類盲目崇拜科學，追求工業文明，從而對氣候和生態造成了破壞。在這樣的一種人類中心主義下，語言是被動的工具，祇被看作表現現實事物的媒介。聽到王教授的這一表述時，我有種說不出道不明的激動，原來，“帝國主義”不僅僅局限于表述人類社會裏的經濟政治問題，還能用來表達人與自然的關係問題，並且，這樣的形容着實貼切！

接下來，王教授提到了“Green grammar”，這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說到：“綠色語法”突出大自然的主體性或者是人與自然的和諧。聽到這裏，有一滴雨好像下到了我的心裏，沒錯，是一滴雨。若是用一個動態畫面來表示的話，就像是在一塊乾燥、了無綠色的小土地上突然下了一滴雨，而在這雨滴落下之處，一點綠色涌出，然後呈圓形狀迅速擴散，以強勢之姿逼退土地黃氣。剎那間，這塊小土地已是綠意盎然。原來，“語言學習”和“生態文明”是有相關性的，並且密切相關着！

對於學語言專業的我來說，學習語言好像就是學習某一個詞語或者句子，我們祇需要圍着各種各樣的語言符號進行探究，又或者把目光放在“隨着網絡的發展，網絡新詞越來越多，我們應該怎麼翻譯這些詞”、“網絡新詞的利與弊”等相關研究上。當然，我不否認此類研究的必要性和積極效果，祇是這樣的一些熱點研究讓我把語言發展與生態文明劃分到了截然不同的、毫不相關的區域裏。我自顧自地認為，研究語言和發展生態文明是兩類人要做的事，二者毫不相關。我嘴上說着熱愛自然，熱愛山風和花朵，却理所當然地把這些熱愛看作是語言符號學習之外的情感和行為。聽了王教授的分享，我雖沒有大徹大悟，但實實在在受到了一定啟發：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語言和生活是一個有機整體，語言學習和生態文明建設并育而不相害，并行而不相悖。

暑假期間，我有幸參與過重慶交通大學“沙漠土壤化”項目，這一項目就關乎生態文明與綠色發展。“沙漠土壤化”項目是由重慶交通大學易志堅教授研究團

隊，從力學角度出發研究沙漠生態恢復理論與技術的新成果，具有防沙、固沙與生態恢復一體功能。我有幸在“沙改土”後的地裏種植農作物和牧草，比如大豆、玉米、花生和狼尾草。芝麻大小的狼尾草種子住進土壤裏，再到悄悄戴着綠色小帽破土而出，探出頭，然後變成一棵棵綠色小苗，短短一個月，記錄表型的表格上的數字從3厘米、16厘米、50厘米慢慢變成110厘米、145厘米再到210厘米、256厘米……最後，一顆種子變成了一株比成人還高得多的牧草。我親眼見到了沙漠變成一塊土地，再披上綠衣。大風還是會刮，黃沙還是會飛，不同的是，這片土地上已有一兩米高的綠草起舞。這樣的場景令我欣喜，也讓我對這大地的綠色未來充滿信心。我想，無論是做什麼，都需要一顆對土地、山川的熱愛和敬畏之心。唯有熱愛自然，保護自然，與自然和諧相處，生命才能延續，才有歷史，文學，技術研究的繼續。

在這次講座中，王教授引用了語言學家韓禮德的話“語言并不被動地反映現實，語言主動創造現實”，來告訴同學們語言并非被動的工具，語言具備創生能力。他還提到了“體認語言學”的提出者王寅教授（王治河教授在談到王寅教授時，滿是欣賞與贊譽。他借分享王寅教授的經歷來告訴同學們，沒有人是可以隨隨便便就成功的，這一點我十分贊同），指出“體認語言學”是有機語言學的一個重要理論成就。王教授在分享中提到，在有機語言學家眼裏，語言絕非被動的工具，語言具有驚人的創生能力。通過命名，語言賦予萬物以溫度、光澤、色彩與意義，有營養的語言如金子一樣珍貴。生態文明時代，有機語言可以大顯身手！他給大家舉了一些例子，比如我們可以用“無價之寶”代替“自然資源”。原因何在？“自然資源”這一稱呼就好像我們把地球上的礦產視作資產，也就是說，我們祇是把自然界看作人類擁有的、可利用的和可剝削的物質，而不是珍貴的、需要珍視和保護的存在。這樣的語言在一定程度上讓我們忽視了自然界的鮮活性

和人與自然的平等性。他還說到，我們可以用“一花二果”代替“一石二鳥”，因為如果一花結二果，便是收穫之外的意外收穫，我們取得的是雙倍的正向結果。而一石頭砸二鳥，畫面可想而知，并不和諧也不美妙。同樣，我們還可以用“時間就是生命”代替“時間就是金錢”。我們皆知生命可貴，所以將時間與生命劃等號，足以體現時間的重要性。然而，如果把時間與金錢放在一條水平線上，就偏向利益化了。如果我們發展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絕佳狀態，我們可以不重視金錢，但是不能不重視生命，所以，將時間與生命對等起來的確要比把時間和金錢聯系在一起好得多，并且更符合生態文明發展的趨勢。用王治河教授分享的一句話來說就是，由于生態文明是一種肯定生命的文明，我們要努力讓每一個生命都綻放自己的美麗。語言是動態的，具備一種生命之力，那麼當語言介入生態文明，我們是不是會發展得更加和諧呢，我想是的。

講座的最後，王治河教授分享了他在家中種的有機蔬菜和水果，從圖片上可以看出，植物都長得特別好。確實如此，祇有真正熱愛自然的人，才能種出具有生機的果。王教授還給同學們看了他閑暇時外出騎車的照片，我依稀記得，王教授說騎車是一種品味，意味着你親近自然、親近周圍的人們。此言有理！騎車和坐車不同，騎車時你在擁抱風而不是躲着風，頭上是天空而不是車頂，你可以隨時停下看太陽，而無需從車窗探出頭，找太陽在哪兒。

心中感觸頗多，奈何言辭匱乏。非常榮幸能聽到王治河教授的分享，從他的言語中，我能感受到他對有機語言學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視。我想，他常佩戴的那條紅色領帶上的“大道之行也”就是他心中對這個世界最大的期許、最好的祝願！當然，我也會一如往常，將陽光與土壤，水流與鮮花看作無價之寶，每天都抬頭看太陽！常說有機話，做有擔當的新時代生態人！

（作者盧明艷，重慶交通大學外國語學院研究生）

《世界文化論壇報》

主編：

樊美筠

編委：

王治河

朱易

謝文鬱

黃勇

馮毅

曾慶華

倪培民

王蓉蓉

顧問：

葉朗

周桂鈿

安樂哲

樂黛雲

學術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丁子江

丁宏偉

王寅

任平

劉孝廷

成長春

劉全華

劉笑敢

李晨陽

曲躍厚

陳俊偉

李惠斌

林克勤

吳國盛

楊富斌

陳榮灼

歐陽康

金惠敏

張修玉

俞懿嫻

顧林玉

魯樞元

鞠實兒

溫恒福

責任編輯：

許迎輝